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世界城市」到「全球城市」

From "World City" to "Global City"

doi:10.6752/JCS.201206_(14).0011

文化研究, (14),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 2012

作者/Author : 伊豫谷登士翁(Toshio Iyotani)

頁數/Page : 320-33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11](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四期（2012年春季）：320-337

從「世界城市」到「全球城市」

From “World City” to “Global City”

伊豫谷登士翁

IYOTANI Toshio

馮啓斌 翻譯

Ci-Bin Fong

一、前言：領域(territory)的解體與新場所性的建構

龐大的過剩資本正在世界市場上遊走。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曾擔心資本主義將淪為金錢遊戲，然而，在被稱為百年一見的經濟危機的時代，隨著規模與性質的變化，天文數字般的金錢卻操縱著世界經濟，這種規模和性質，是凱因斯參與規劃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Agreements)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所無法相提並論的。巨額的流動性過剩資本來往找尋創造財富的場所，流入龐大資金的小國陷入泡沫經濟，一夕之間成為負債國。像這樣的景況，在這約二十年期間我們已見證多次。此刻，危機的根源已擴大到全球，在世界市場上游走的過剩資本，使得經濟的成長和貧困趨於極端，流入過剩資本的地方甚至從城市景觀、國家樣貌乃至人們的生活與規範都產生極大的改變。

龐大的金流創造出什麼樣的空間和場所？絕不只是擁有華爾街與花旗銀行等在泡沫經濟中成長的巨大城市、暴漲暴跌的地價、電腦銀幕上顯示的虛擬空間。雖然大部分經濟交易都在電腦構成的數位空間裡進行，但交易金融商品的生產過程卻是在實際存在的空間裡進行。為了支撐這個生產過程，需要有設備或機構，最重要的是，需要有構成這個實際空間的各式各樣的人。所謂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即是由巨額資金所創造出來的新空間、新場所¹。

泡沫經濟崩潰及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事件以來，普遍認為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由於貨幣經濟擾亂實物經濟之故。將之視為「投機」來批判並不困難。然而，若脫離黃金束縛的貨幣開始自成虛擬資本、肥大化的過剩資本在世界市場上徘徊，尋求去處，事態顯然嚴重²。因為對國際過剩資本發揮相當抑制作用的美元本位匯兌制、IMF、GATT體制、冷戰體制等戰後世界體制正在急速崩壞，透過市場化，巨額資本的以赤裸裸的暴力姿態展現。

在被稱為全球化的時代裡，超越國境的資本活動是如何將空間重組、並創造出新的活動場所？是不是資本主義已無法控制？抑或仍有方法可以規制、介入全球資本創造的世界？本文並非直接回答前述提問，而是從「全球城市」這個概念來認識由資本的全球化流動所創造出來的空間，以及其具體場所的變化。

資本沒有疆界，其活動正是從跨越疆界開始。商業資本利用共同體、國家與大陸之間在價值體系上的差異並且與之結合，創造出現代世界。商業活動的擴大使得各種情報擴散開來並刺激生產活動、創造貿易與金融網絡，同時亦促使大規模的人口移動。跨越國境的資本移

1 此處所謂的「空間」係指涉從特定觀點切入的分析性概念，「場所」概念則是前述「空間」概念層疊且地理上賦予特定意義的地域。本文的關注的問題是，「空間」和「場所」在疆界的意義上有何不同。「空間」的疆界是抽象的，例如依不同電腦會有不同的路徑等可以反映此特點；「場所」的疆界則有特定的具體範圍，可依地理的疆界來劃分。我想到的是沙森(Saskia Sassen)所說的「全球城市的場所性(placeness)」(*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91)。

2 板木雅彥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誕生了國際過剩資本最發達的形態」（《國際過剩資本の誕生》〔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頁i）。其簡潔的涵義，例如他說：

來自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絕對過剩資本緩緩累積，因所得再投資與資本利得不斷增加，最後從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分離，以債券與股票的形式在世界流動的資本，這種資本係為國際過剩資本的一般形態，亦或是其絕對且相對的形態。當國際過剩資本以國際虛擬資本（證券資本）的形態完成時，其與世界各國的產業資本將主客易位。(196)

動，將世界經濟組成單一空間的同時，也把發揮此功能的場所組織為國民經濟，並維持其再生產。資本原本就是越境的、全球的。

跨越疆界的資本活動，包含服務在內的商品與資本的移動，以及伴隨著人口移動，重組了既有空間並重新構成具體的場所。被重構的場所跨過疆界連結、創造出單一空間。然而，資本創造的空間並不是一個疆界消失的均質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會產生各種斷裂與縫隙。在每個場所中，政治會介入、也有住民生活的場所。資本所創造的近代世界空間的具體場所，並不是依循一貫的資本理論生產、再生產而來。每個個別的場所都是保有該場所的歷史痕跡並重新組成的場所³。而具體場所的單位，被默許、預設為國民國家，國民國家的疆界因而占據著特權位置⁴。

人們常認為經濟是全球性的，而政治與文化是國家的。商品與貨幣常被認為有超越國境的「普遍性」，而權力與文化樣式等則帶有「地域性」。政治與文化總被刻上國家性(nationality)的印記。世界經濟這個用語——例如國際金本位制、IMF、GATT體制或世界貿易網——可以設想有某種實體的機構或系統。但像世界政治或世界文化這種用語卻有甩不掉的彆扭。在經濟活動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將超越疆界的近代合理性貫徹得最為徹底的形態，而文化與社會則強調異質性與差異。

然而，經濟的去領域化和政治與文化的領域化是相對的。經濟活動跨越疆界、強化全球規模的運動，但作為勞動力的國民以國家單

3 將城市看作對資本的場所限制，是來自哈維(David Harvey)在《ポストモダニティの条件》(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吉原直樹譯，東京：青木書店，1999)的發想。他認為：「隨著空間上的阻礙減少，現今全球化的城市體系中的階級再次確認並重新組成」(379)。本文在後面也會提及，支撑全球城市的體系者，是城市之間的競爭？還是網絡？端看從什麼角度來掌握全球城市這個概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問題。

4 無須贅言，國民國家處於特權位置這點是歐美中心的看法。這不是指在邊陲地區國民國家的疆界沒辦法穩固地掌握。而是指，歐美各國民國家的形成是和殖民地的形成同時進行，邊陲地區的國家形成是以殖民地的形式展現。

位再生產，國際間的工資差異毋寧是基於疆界牢牢地維持著。國家是資本主義的搖籃，這種說法甚為普遍。抽離國民國家，便無法談論近代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雖說政治與文化也是以國家單位構成，國內政治也沒辦法與國際政治劃分開來。文化則藉由資訊或人的移動等方式，跨越疆界相互滲透。更重要的是，政治與文化是在國民國家體制中被「發明」出來，並刻意被加上疆界的。

即使如此，政治與文化的領域化相對於資本的去領域化、只能在受到限制的場所中發揮功能。正如典型的貨幣黃金，商品與貨幣這種世界的共通語言使得資本很容易跨越疆界，而像語言或習慣等等則劃出疆界的場所，發揮限制資本活動的功能。然而，資本在超越疆界的市場上競爭、獲得在國境遊走的條件，使得劃出疆界的場所限制因而消失。亦或使資本從場所限制中解放出來的條件，係隨時代產生變化。劃下場所限制的國家一方面介入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找尋吸引資本的誘因。跨越國境的政治、文化標準化，至此也在各個面向上開始進行。

所謂的全球化，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不只是經濟，而是政治與文化的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不斷向極端推進的時代。如果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可以說市場化侵蝕政治與文化，並侵犯、動搖了所謂國民國家的領域。金融商品這種極度抽象的商品登場，加上被稱為「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與「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這種概念的擴散，使得跨越國境的標準化開始朝極端發展。這種發展會重構國民經濟、國民文化與國內政治等等以國家構成的單位，這也意味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空隙。

若審視21世紀的社會科學，發展至今的社會科學，默許將國家的領域作為前提，專門化、體系化、制度化學科分類，在此便有重新確認的必要。誠如推動批判性全球化研究的艾波本(Richard P. Appelbaum)與羅賓森(William I. Robinson)所主張，全球化研究並不只是至今與「國際」有關的衆多研究領域的延續。必須認識到，這是在超越國家間關係的全球化時代。執是之故，為使全球化研究得以發展，必須要求社會科學超越過去「方法學的國族主義」窠臼。他們強

調，所謂「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不只是瞭解跨國現象的具體展開，而是包括思想與哲學、在方法上的課題，是超越以往學科分野的研究課題⁵。「全球城市」這個分析概念，可視為發展全球化研究在「分析上的戰略性方法」⁶，藉著對國家的空間如何被解體／重構提出疑問，以試著對社會科學的存在方式提出挑戰。

二、全球的統合化與「世界城市」的轉變

資本創造的場所並不是單一方向地從中央到邊陲。正如後殖民研究所指出，以借助西歐諸國之力的文明化物語所描繪出的殖民地化的過程是，與宗主國自身國民國家的形成過程互為表裡關係的。宗主國與殖民地在文化上的共鳴，在此不多贅述，但舉例來說，就連創造擁有主權的國民國家的裝置，都是在與殖民地、邊陲的交涉過程中產生⁷。

同理，中心城市的世界性也是在和邊陲城市的世界性產生關連

5 Richard P. Appelbaum & William I. Robinson eds., *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2005)一書的緒論中，關於「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的特徵，編者有如下說明：

全球研究並非從一個個國民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interplay)來看待世界，而是將之視為一個單一而複合的交互作用(interactive)系統。全球研究之焦點非是國際關係，而是在跨國(transnational)的過程與複合的作用與流動，並且從不斷出現的跨越國境的現實狀況中找出一系列理論性、歷史性、認識論層面的問題以及哲學性問題。而且，研究這種現象的分析觀點，並非基於單一的政治學領域，而是建立在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等多種專門領域上的理論性作業。

6 S. サッセン(Saskia Sassen)，《ローバル・シティ：ニューヨーク・ロンドン・東京から世界を読む》，大井由紀・高橋華生子譯（東京：筑摩書房，2008），頁387。

7 R. Mongia在批判J. Torpey的*Invention of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時指出，國家介入人的移動這種「主權」行為，未必是從國民國家自立發展中形成，而是從與殖民地關係中發展的。可參照“Race, Nationality, Mobility: A History of the Passport”，收錄於A. Burton ed.,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之際形成、發展而來。宗主國的中心城市亦即帝都，跨越疆界對外開放、與殖民地連結。帝都是通商、金融、運輸等中樞城市，殖民城市則作為經濟支配、政治與軍事戰略上的重要場所而成立，同時也是歐美帝國的政治與經濟、文化上的實驗場所。可以說自資本主義發展以來，城市即具有世界性，在帝國主義時代，一舉將近代的城市全捲進世界化之中。

然而，「世界城市」(World City)這個概念至1980年代以後才普遍化⁸。城市的發展脫離國民國家或帝都物語的束縛，並且以「世界城市」問題化的背景，是在被稱為跨國企業的大型企業顯著地推進世界的統合化，以及「世界城市」這個空間的發展一併將發展中國家捲入其中之後。作為據點或飛地的世界城市的連帶，在大型企業的世界性規模活動中大大地轉變。被視為資本主義發展指標的城市化，變成世界經濟統合化的指標。

甚至可以說，跨國企業把世界納入企業組織之中的同時，也將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納入適合作為企業活動據點的空間之中。世界城市這個概念因此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因而被重新探究⁹。這樣的變化或可說時代轉變的起點，可以說是在跨國企業這個語彙被廣泛使用後、世界經濟的統合化將發展中國家捲入其中而產生新局面的1960年代後半乃至70年代之際¹⁰。跨國企業的總部集中在

8 讓世界城市這個概念廣為流傳的，是傅里曼(John Friedman)在1986年發表的“*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69-83)。關於世界城市論的系譜，請參照吉原直樹編，《*城市的思想：空間論の再構成にむけて*》（東京：青木書店，1993）。

9 例如，Barnet和Cabanagh將跨國企業稱為21世紀的「世界帝國」。「在獲得地球規模的技術、任何地方都能成為生產地點、開發出可以在世界各地販賣的商品以及將信用遍及全世界，村莊和各地區也透過傳播的全球網絡連結起來，藉著這些情況，跨國制度正朝向21世紀的世界帝國發展。……」(Barnet & Cabanagh, *Global Dream*, 1994)。

10 1973年聯合國發表關於跨國企業的報告書(UNITED NATIO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 1973, pp. 13-14)有如下陳述：

1971年時全部的跨國企業的產值，據推算約有五千億美金，然後這只不過約相當於不包括中央計畫經濟國家（社會主義國）在內的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國際生產總額係依海外企業的

紐約與倫敦，關係企業則聚集在發展中國家的大型城市。如此，亞洲超級城市的興起，便無法只用「過度城市化」或「假的城市化」的觀點來確實掌握，必須考量和「資本的國際化」或「新的國際分工」的關連才行¹¹。

直接投資這種形態的資本國際化，從1960年代後半到70年代以降，包含發展中國家在內，創造出跨國企業的世界戰略。直接投資以擴大支配為目的，而重要的是，首先不只是資源產業，生產據點具高自由度的製造業亦然，在世界性戰略指導下，企業的活動開始跨越國境；其次這種支配的擴大狀況，從原本歐美各國之間的「相互滲透」變成將發展中國家也捲入其中。

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的海默(Stephen Hymer)，他對跨國企業的定義是：放眼整個世界以建立企業戰略的企業¹²。名為跨國企業的大型企業，將負責經營戰略的中樞機能集中在特定的城市，這些總公司群聚的各先進國家大城市因而摩天大樓林立。生產據點則設在世界薪資最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並聘用勞工。世界城市論因而可以將總公司視為頂點，其下則以世界各個城市的金字塔型階級結構來思考。例如紐約、倫敦和東京即為頂點。

在此，應該先確認的是，城市世界化的新局面，與資本主義世界化的變化有密切關連。城市的變化，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在聚集於城市的企業功能、以金融與企業服務產業為中心的產業結構等。二十四小時的消費模式與生活樣貌，反映出城市景觀也有顯著的改變。然後世

支配或決策下所進行的生產來定義，若加總跨國企業海外分公司
的營業額的話，國際生產總額將會超過作為國際經濟交流主要媒
介的貿易總額。1971年的國際生產總額推測約達3,300億美金，
這超出經濟各國全市場的總輸出額（3,100億美金）。

11 其代表性的研究之一為T. G. McGee & W. Armstrong, *Theatres of Accumulation: Studies in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Urbanization*(New York: Methuen, 1985)。關於發展中國家的「過度城市化」，請參照拙作《變貌する世界城市》（東京：有斐閣，1993）。

12 S. サッセン(Saskia Sassen), 《多国籍企業論》（宮崎義一譯，東京：岩波書店，1979）。

界城市反映出世界規模的勞動市場重組，開始接納大量的移民勞工。

被稱作發展中國家的地區，包含農村人口在內被併入資本的國際化，在極短的時間內歷經城市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將世界人口占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併入全球規模生產過程的條件已然成形。這個情況與世界城市如何產生關連？而中心的世界城市化又如何與邊陲的世界城市化連結？我想藉沙森(Saskia Sassen)提出的資本積累與移民勞工型態的變化來考證。

她將資本積累的差異造成國際勞動力移動的型態分為以下四種類別¹³。第一種類型是當中心諸國的資本積累往邊陲擴張之際，人口也隨之移動，1960年代後的加工出口區即為典型，這是因跨國企業投資發展中國家所帶來的勞動力移動。第二種類型是，在邊陲地區急遽增加的資本積累與移民勞工的流入結合發展的情況，典型的例子如東亞各國與石油出產國家的工業化。第三種類型是世界經濟中心的各國資本積累急增，促使移工流入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各國的高度成長期間，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的移民勞工即為此類。相對於前述各類，第四種類型是基於資本積累的變形所產生的現代移民勞工，未必和急遽增加的資本積累有關¹⁴。應對資本在世界的新發展所形成的全球勞力支配方式，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積累方式所產生的新型態移民勞工，我們可以從這兩點來掌握現代移民。若將前述的分類與城市的全球化連結起來，可整理如下。

1950、60年代歐美國家的高度成長之所以可能，係因舊殖民地等邊陲國家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工（第三類型），基本上一直輸出移民的

13 S. サッセン(Saskia Sassen)，《労働と資本の国際移動》（森田桐郎譯，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58-61。

14 筆者曾將這種資本主義的變質，以「相對性過剩人口機制的功能麻痺」與「新勞動力供給的枯竭」來討論。也就是說，失業者使得薪資被壓低、確保勞動市場的彈性這點，非但沒有發揮產業預備軍的效用，反而將農村社會的崩解推到極致，使得農村不得不成為追加勞動力供給源這種角色的水準。簡白地說就是，勞動市場的組成產生結構上的轉變，跨國的勞動力供應源被發現，可以說勞動市場因此全球化。參照拙作《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移民》（東京：有信堂，2001）。

歐洲各個城市，至此時期開始接受大量移民勞工，迅速朝多民族化發展。當然，這種民族多樣性有各種形式，例如從舊殖民地來的移民勞工、基於國與國之間的條約的外籍勞工(*Gastarbeiter*)政策，以及來自東歐與南歐的大量難民等等。至此，不只被稱為移民國家的國家，連同許多走向高度成長的歐洲各國，首次直接面臨所謂移民問題，移民問題成為以社會問題層次出現的城市課題。

與此同時，受到由跨國企業帶來的世界統合化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在發展中國家裡從邊陲地帶的農村到城市，以及周邊國家到新興工業國家的大量人口移動（第一與第二類）。不單只是來自外國企業的直接雇用，以輸出導向的工業化也引發了廣泛的產業結構轉換。不只被稱為NICs的新興工業國家，曼谷、雅加達等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也經歷急速巨大城市化(megacity)的過程。

製造業這類生產地點具有高自由度的產業類型往低薪資水準的發展中國家散布，先進國家企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類型與單純生產工程急速移往海外。若圖象化來說，邊陲的勞動力往中心移動以支撐高度成長，中心的資本則往邊陲移動以生產低廉的產品。資本發現了發展中國家有無止盡的勞動力，無可避免地走向利用世界勞動力統合化條件的局面。世界城市則在這種條件根源處產生。

以1970年代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為契機，被稱為「黃金時代」的高度成長期結束，資本主義各國內大量失業者成為常態。然而，失業人口增加，未必減少人口的移動。歐盟各國對於新移入的移民實施規制，但原有的移民數量並沒有減少。美國自70年代以後，舊工業地區增加的失業者與移民勞動者加速成長，兩者是平行的。在先進各國中並不是資本積累急速上升與勞力不足，儘管有大量的失業者存在，移工卻持續增加。從南方的發展中國家到北方先進各國的現代移民勞工，是為第四種類型。

歐美各國高度經濟成長的落幕，也意味著永遠成長的神話所支撐的福利國家體制的終結，以及產業結構變化造成雇用結構改變的時期。傳統產業的衰退致使製造業失業人口增加，正式聘用的職業種類減少的同時，城市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等等成長中的產業類別則增加

約聘員工。鋼鐵與汽車等一直以來被視為主力的產業則減少雇員，以及不安定的城市新型態服務業的勞動力則需求上升。

需要正式聘用的職業種類衰退，以及約聘制職業種類的增加，正是因移民勞工流入所引起的。找到正職工作的勞動者並不願意轉到約聘的職位。過去的產業城市／工業地區失業率上升，而城市裡約聘制職業的就業人數不足¹⁵。移民勞工的角色，並不是造成前述那樣人手不足的主因，而是資本積累機制的變化。資本主義已不若過去仰賴固定的正職勞動力，而是透過大量聘用非正職員工的勞動力來累積資本¹⁶。

面對景氣調整所需要的勞動力，從包括國外在內的產業後備軍網羅。產業後備軍與新加入的勞動力供給朝全球發展邁進。此事其間的涵義非常重要。第一，勞動力價值的低落是世界規模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是國家能發揮的最重要經濟功能之一。近代國家透過教育與醫療，擔負著將國民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角色。以失業者為人力來源的產業後備軍，一直以來藉著社會政策以及靠著福利國家政策而得以在制度上獲得最低生存保障。然而，由於創造了在國民經濟外部亦得以擁有無盡的勞動力來源可供使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基於產業後備軍的全球化，由國家介入生命的再生產因而遭到限制。換言之，這是福利國家式保證制度的退步。全球勞動後備軍不只是從邊陲提供廉價的勞動力，也造成中心的勞動力價值下跌。也就是說，以全球的規模來決定工資的最低基準。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滲透、世界規模的勞動力價值下降。

第二，在先進各國出現大量無法以國內（國民）勞動維持的職業類別，變成沒有移民勞動力，國民經濟便無法成立的情況。常有被稱

15 這個過程十分複雜，在此省略。詳細過程請參考拙作《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移民》（全球化與移民）（東京：有信堂，2001）。

16 關於這點，請參照R.ライッシュ(Robert B. Reich)，《勝者の代償》（清家篤譯，東京：東洋經濟，2002）。在該書中，他指出「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正式雇用反倒才是創新的東西，從結果來看，這是個短命的創新。正式雇用在過去大規模生產時代的一個半世紀期間，在美國與其他的先進國家中流行，而現在則將宣告其終結」（頁144-145）。而現在「大部分的福利貧民只是變成就業貧民罷了」（頁271）。

為「（國民）不想從事的職業」的職業類型。但這些特定的職業，並不是在本質上就被預設為不想從事的職業。倒不如說和薪資低廉及社會地位不穩固有關，並不是缺乏福利，而是就業困難。像這樣的職業種類，對於一直以來處在相對安穩的領域中的勞工而言，就成了「不想從事的職業」。不穩定的職業並不限於中小規模的企業與建設等衰退的、季節性的職業類別。反倒は大量出現在先進的產業類別中才是重點所在。也就是說，被稱為先進的產業項目如資訊通訊產業與服務業、支撐先進的產業領域的基本生產工業、以及以提供高級專業人士服務的城市型服務產業，皆非常仰賴前述不穩定的職業類別。以新的成長產業項目出現的產業，大量製造出新的不穩定就業層。而這些產業以大城市為據點，往大城市的流動和移民勞動者的流入，使得空洞化的舊產業城市只剩下失業者。

第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並未減輕移民輸出的壓力，反而加速推進農村社會的瓦解，並增加更多潛在性移民。美國配合移民規則，採取擴大對移民輸出國的援助與促進企業發展政策。但這樣的政策卻推進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社會解體和城市化，與政策目的恰恰相反，反而增加了潛在的移民預備軍。先進國家的企業到發展中國家投資與消費文化的滲透，就連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社會也受到影響，造成前所未有的人口移動規模。發展中國家提供無盡的勞動力，使大型企業擁有利用這些勞動力的可能性，被稱為世界勞動市場的勞動市場變成現實。資本，一方面藉著生產活動的全球化發展，另一方面透過移民勞工的流入，變得不得不利用世界勞動市場。流入先進國家的移民勞工，以及因此造成的世界勞動市場，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其潛流是巨大的、世界規模的移民流動。

第四，對於被稱為發展中國家的各國來說，勞動力才是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品。過去的發展中國家是原物料的生產與輸出國家。但從1960到70年代之際，跨國企業完成包含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生產統合化，發展中國家因而變成生產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的產品所在，其人口也全面被納入這個生產過程之中。也就是說，動員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為受薪勞工的條件已經備齊。而且，這些低薪資勞工被發現為最

具國際競爭力的商品。擁有大量低薪資勞工的發展中國家，大多採取以國家的制度將勞動力輸出的政策方針。

勞動市場的全球化，不只是將邊陲地區的低薪資勞動力納入生產過程，跨越國界網羅勞動力供給亦成為可能，勞動力被當作商品移動。在發展中國家，移民的匯款不但是家計維持的手段，也是取得外幣最重要的手段。從歐美先進各國到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皆被迫世界城市化，否則就可能面臨衰退的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的中心城市，隨著被稱為新富的中產階級抬頭，非正式部門的經濟活動也在擴大，形成廣大的貧民區。在全球化的勞動市場上，差距亦全球性地擴大，在世界城市之中，在中心裡產生邊陲、在邊陲中亦出現中心。

三、全球城市：財富與貧困的交會地

大型企業的世界統合化所造成的世界城市化，並非朝同一方向直線前進，創造出一個均質空間。首先是將發展中國家納入的1960年代後半到70年代，接著是冷戰體制的崩壞與擁有過剩資本的金融支配擴大化的90年代，然後在朝財富與貧困交會、國族主義與全球化的齷齪檯面化的21世紀的轉換過程中，隨著全球化局面的發展，所謂世界城市的現象亦有所轉變。

所謂的全球化，是經濟總量轉換空間、創造出新的場所性的時代。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過去以默許領域與國家一致為前提的近代的框架大幅度轉變。以國家間關係構築近代世界的時間與空間被迫重組，一直以來支撐領域性的近代世界制度與機構開始改變型態。空間並非給定之物，若將之視為「社會性生產物」，並且是在「歷史」的累積層疊後產生之物來描繪的話，空間的均質化、斷片化和序列化等特性，就必須透過超越國境的範疇來重新掌握¹⁷。在此要注意的是，

17 菲伏爾(Henri Lefebvre)所著的《空間の生産》指出，「空間中有歷史……空間中的歷史自此必須要被書寫」（頁9），而近代世界的空間有均質化

與「世界城市」區分開來的分析概念「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不是世界城市的延長，該處係為表現至今仍不斷發生的變化所投射出來的斷裂或裂縫的場所、空間。

誠如前述，世界城市的階級化，常被擬作跨國企業的企業階級制度。因為以總部為頂點的企業組織，其地理配置和聚集巨大企業總部的世界中樞城市為頂點的世界城市序列是一致的。因此，城市在金字塔型的階級序列向上爬升的方法，便是必須和其他各城市競爭。城市不只在硬體方面，也包括軟體在內，將基礎建設整備妥善，意圖吸引海外企業。世界城市被置於跨越國境的城市間競逐的比賽之中。無疑地，許多世界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面對這種城市間競爭。為了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材，城市致力於建設舒適的生活環境。資訊基礎建設的完備程度，以及航空網絡與運輸系統的轉運功能，決定城市的命運。名為全球城市的城市也不例外。

然而，全球城市是世界城市的延續嗎？跨國企業的總部不一定要設在中樞城市，甚至可以說沒有這個必要。資訊通信的發展，反倒使得企業活動有可能分散，即使是總部的機能，也有設在遠離中樞城市的情況。這種情況表示，支配世界經濟的中樞機能，很明顯地專業分工化，並且不能再用以往總部功能的概念來理解。或許也可以換個說法：世界經濟的統合化已進入新的局面。這個變化表現在以控制世界經濟為目標的企業者服務與金融機能在結構上的轉換以及多樣化。

沙森強調「全球城市」不只是「世界城市」的延續，而是新的局面。她將全球城市定義如下：

在現今世界經濟的局面下，經濟活動的全球分散與全球統合的連結者即為全球城市。由於全球統合，在經濟的所有與支配持續集中之際，某些特定的主要城市擔負起戰略性的角色。這些城市才是我所謂的全球城市。在被稱為全球城市的城市中，也有幾個世紀以來都是世界貿易與金融中心之所在的城市。然而，超越這種長時間以來的功能，今天的全球城市有以下三個特徵：第一，世界經濟組織的

命令功能；第二，對於現代主要產業的金融和以企業為對象的特別服務來說，是個關鍵場所也是市場；第三，是這些產業主要的生產場所，也是這些產業技術革新的地方。……全球城市是不能獨立存在的。¹⁸

在此我想參考她的定義，從新的理論性推導的觀點將所謂全球城市的空間及其作為具體場所的特徵，分三個層次梳理。亦即，所謂的全球城市：第一，是擔負連結全球統合的戰略性角色的場所；第二，是超越長期以來世界城市的功能，發揮新特定功能的場所；第三，並非單獨存在，而是以網絡的方式形成的場所。

第一點所謂全球城市是戰略性的場所，意思是指具有世界經濟的中樞命令功能和金融、企業服務功能的接點，不僅如此，可以說全球城市創造出應對全球化這個資本主義新局面下統治世界的新功能，並將跨越疆界市場化帶來財富和貧困的累積聚集起來重組的場所。換句話說，全球城市作為世界財富與貧困的交點、作為全球經濟的、政治的及文化的機構運作的場所，戰略性地被創造出來。

支撐企業活動全球化的各種服務商品的生產及金融商品等新商品出現後，全球城市進入新的局面。城市聚集了生產控制複雜化、多樣化世界之能力的功能，全球城市因此被重新組成。這些商品的生產需要極高度的專業能力與大量資訊，處理這些的許多企業群聚集在一起。並且，作為一個不只是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統治也成為可能的場所被重組。這不盡然是以往大型跨國企業的總部功能的匯集。毋寧是創業投資接二連三地創造出企業者服務商品與證券化商品，巨額的金錢流入該場所後形成的城市。然後在該處，創造出超越國家主權的法律、產生全球文化。是一個生產、交易市場化的全球統治體系的場所。

但是大量資訊與巨額金錢並不是只在虛擬空間之中。生產資訊與情報這種商品，需要人們在實際的場所勞動。將生產這些商品的高級專業人士從世界各地網羅而來，則需要建構高水準的便利的環境。最

18 S.Sassen,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2nd.ed(Newbury Park: Pine Forge Press, 2000), p.4.

重要的是，必須要有足以支撐這些的低薪勞動力。也就是說，創造現代財富的系統所構建起來的場所，就是全球城市。

決定全球城市方向的，除依據資本理論組成的虛擬空間的整合方式以外，不外是在其中營生的人們。在這個一天有幾兆元資本流竄卻只有極少數的人擁有天文數字收入的世界，支撐這個世界的是大量的單純勞動者。擁有高度專業知識的人們在高科技通訊技術所連結的大樓群裡工作，而支撐他們的是幾倍於他們的人數的廉價勞工，其中很多是移民勞工。世界收入最高的人們，與可以說是現代貧困的非正式員工共存。全球資本不只需要虛擬空間，實際的場所也是必要的。而這個實際的場所，不是只由高薪資收入者組成，而是由大量低薪資勞動者所支撐的。世界規模的富庶創造出世界規模的貧困，這是全球城市論最重要的課題。

第二個新特定功能，當然是指新的企業者服務・金融的中樞功能。始於1960年代後半，生產過程的世界性轉移，促使企業的經濟管理功能往世界城市集中。但從1980年代後半開始，世界城市的面貌開始大幅轉變。世界經濟的中樞機能，在跨國企業的全球管理支配功能及支撐這項功能的企業者服務功能之上，增加了新的企業者服務、金融商品的生產功能。隨著金融管制放鬆而興起的新金融資本，使銀行不再只是從事過去傳統銀行的業務，而是轉變為取代操作高達數兆元、巨額過剩資本的投資銀行，以及製造避險基金等依據金融工程的新金融商品之企業群。與這些金融商品的生產相關的新企業者服務群也隨之興起。

建立在複雜數學的金融工程，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為首、創造出大量的金融商品。不只是產油國與舊社會主義圈，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支配階級在內的龐大過剩資本，往世界經濟的中樞城市流入。世界城市以新的金融商品交易場所之姿重新改變面貌。位於金融功能中樞的，不是過去傳統的大型跨國銀行，是由許多營運各種金融功能的企業群所組成的海外市場，「恰如矽谷」那樣，是聚集許多企業集團的世界級「金融中心」。

第三，全球城市，不是以往城市間競爭的世界城市，而是依「世界城市的網絡構成的場所」所構成。當然並不是指一直以來都是世界經濟中心的紐約與倫敦的重要性下降。這兩個城市至今反倒仍舊是全球城市的中樞。但是在此應該要注意沙森指出「全球城市不能獨立存在」這點，以及把東京算進全球城市的積極意義¹⁹。全球城市並非單獨存在，而是透過綿密通訊網構成的網絡所連結起來的空間來發揮功能。在該空間中生產控制世界經濟的能力，當然也創造財富。那是一個無限的符號商品持續不斷地生產、流通、消費的虛擬空間。這點已經超越過去那種依據國民國家間的關係所構築的統治框架，可以說是新世界經濟的統治功能。

虛擬的全球空間因帶有巨大過剩流動性金融資產的動向而改變，經濟的全球化不再能只用跨國企業與跨國銀行的全球集中化或全球治理能力(global control capability)來討論。80年代到90年代的國際金融危機已表現出此問題。作為新的金融商品生產的場所，全球城市因聚集許多金融相關服務企業而成爲金融中心，其全球統合能力透過全球網絡連結，重新組成爲全球城市。

然而，這種轉變，不是簡單地從以往的世界城市中樞機能出現，也不是從城市的階層化功能導出的結果。毋寧需要在地政學上分散的城市功能之間，能密切地連結功能性分工的城市網絡。正如二十四小時化的世界市場所示，換個說法即是將分散的世界經濟功能集中起來

19 針對將東京稱爲世界城市這點也有些人有不同意見，在提到受泡沫經濟攬局的城市時，東京經常被提出來。無須贅言，東京並未成功發展爲足以和紐約與倫敦匹敵的「國際金融中心」。倫敦與紐約聚集了大量金融起源的生產者服務功能以及控制世界經濟的秘訣。我們很輕易就可以推知，這種支配世界經濟的權力，與英國與美國在歷史上的霸權位置是相關的。相對地，東京則被視爲「非霸權依存型」、「意圖成爲」世界城市。在此所說的世界城市是「不只是政治意識形態而是近於一種應然概念」。地位跌落到單純提供資金的東京，已喪失世界經濟的中樞城市的位置（町村敬志，〈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城市空間の再編—複数化していく経路への視点〉，收於似《越境する城市とガバナンス》）。然而，沙森的意圖並不在於將全球城市放在歷史發展而來的霸權城市的延續上，提出位於亞洲的東京所要強調的是，專業化的全球各種功能的分工。換言之，藉著加入以東京爲代表的非歐美地區爲始，全球城市才算完成。

的機構。構築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失敗，並持續限制從世界勞動市場輸入低薪資勞動者的東京，在另一方面，經濟持續發展成為亞洲的中樞城市，也是持續提供大量金融資產的城市。東京聚集了大量的資訊和高度的企業者服務功能，雖不能說非常完備，但在和香港與新加坡的分工中，也達成高度的金融功能。和以往的世界經濟主導者不同類型，東京被整合進全球城市之中。

何謂全球城市？恐怕可以有好幾種定義，何況考慮到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沒什麼是固定的、靜態的，某種概念的規定與定義，甚或理論化的作業都要重新探尋。若將吸納全球資本場所的世界城市視為全球城市的話，其網絡便是藉由通信網路等基礎建設的整備所構建的空間，藉著這種虛擬的網在世界擴散。另外，紐約與倫敦的金融中心功能也絕非僅賴花旗銀行與華爾街即可成立。支撐位居全球城市頂點的金融中心功能的，是依階層性構成的世界各地的城市，以及被稱為避稅天堂的黑箱地區，更重要的，是在僅僅數個街區之隔的移民街裡為數龐大的、貧窮的勞工們。

新產業的出現與運送通訊方式的進步，改變了城市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關係。現在不斷出現的新產業項目，不若過去那麼具體，勉強要說的話，便是「符號化的商品」的生產²⁰。其中最先進的領域是，電腦與數位資訊的發展，以之為基礎的金融商品，以及讓全球經濟管理變得可能的生產者服務商品的生產領域。生產這類商品的場所才被稱為全球城市²¹。金融商品與生產者服務這種商品，不只和傳統金融業與資訊產業有關，同時也深入所有產業之中，並且透過從企業到公共團體與年金基金滲透進整個社會。

雷曼兄弟事件的經濟危機，並非重演過去曾有的金融危機。以

20 關於這點，請參照拙作《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は何か》（東京：平凡社，2002）。

21 サスキア・サッセン (Saskia Sassen)，《グローバル・シティ》(The Global City)（伊豫谷登士翁監譯、大井由紀、高橋華生子翻譯，筑摩書房，2009）。本書初稿於1991年出版，之後基於80年代到90年代的金融新發展，第二版於2001年出版。本書採用第二版的翻譯。

這個新的產業領域為震源，將所有的經濟活動捲入其中進行。這個危機，是宣告金融支配時代的終結？還是新時代誕生前的陣痛？最重要的課題是，在這個被稱為全球化的時代下，人們的生活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面對這樣的危機，我們能如何介入其中？²²

21世紀的金融危機直接攻擊全球城市。從金融相關產業到正職勞工都有失業者出現。但是約聘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女性勞動者一直以來都被放在這種不穩定的位置。移民勞工則不只不穩定，甚至也未受到社會安全網的保護。在女性勞工和移民勞工身上，可以見到危機的影響更為深刻。危機更進一步地在全球擴散發展，在發展中國家的邊陲地帶，因少數財富分配的問題使得地區衝突愈加激烈。

社會科學一直以來將貧困視為社會政策的一環問題。而經濟學則常以資源分配為主題，然而，現在的問題是貧窮的分配。究竟要如何才能避免世界性規模的勞動力價值下跌繼續惡化？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課題。然而，只要無法在思想層次觸及這個課題，反全球化主義的思想便常會喚醒新國族主義。就形式上而言，多數人被社會安全網保護，享受穩定雇用關係的時代已然結束，再也無法回到福利國家體制。對應於勞動市場全球化的介入方法，以及保護日常生活的方法，若不從全球角度來思考是沒辦法創造出來的。

22 要如何才可能介入這樣的空間？每個全球城市都由其獨特的地域性，沒辦法以一般論來討論。然而多數人表現意志的手段與場所是被給予的，使之實現的方式也未遭封閉。沙森強調，在這個被稱為全球化的時代下，活化民主主義的方式是存在的。從個別來說，對城市開發與移民政策、經濟援助與企業投資的介入，而對於最近的危機，則反對放棄勞工最低限的住宅保障、醫療及教育等等。她對於將大量的公共資金投入金融機構與大型企業這點批判甚力。